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通往中国语言哲学的小路

周光庆自选集

周光庆 著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通往中国语言哲学的小路

——
周光庆自选集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往中国语言哲学的小路——周光庆自选集/周光庆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8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ISBN 978-7-5622-5156-9

I. ①通… II. ①周… III. ①汉语—语言哲学—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9066 号

通往中国语言哲学的小路

——周光庆自选集

© 周光庆 著

责任编辑:吴小岸

责任校对:方汉交

封面设计:新视点

封面制作:胡灿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3220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310 千字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7.5

版次: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39.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编写说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已走过百年,其前身为文华书院大学部 1909 年设立的中国文学系(文华大学 1924 年更名为华中大学)。百年来,华中学人严谨治学,代有建树,为今天文学院的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此次借“211 工程”建设项目东风,并获得学校和出版社支持,我院筹谋编辑“教授文库”,逐年推出教授自选代表作,结集出版,旨在弘扬学术,传承薪火,以延文学院之文脉,亦尽我辈之责任。

文学院教授文库编委会

2009 年 10 月

自序

——探寻通往中国语言哲学的小路

这本小书如此选编并自名为《通往中国语言哲学的小路》，是想使其成为我大半辈子崎岖的为学之路的自我写照，将其奉献给读者，以便切实求教。

我出生于湖北黄冈的一个贫农家庭，自幼在放牛打柴、忍饥受寒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祖父、祖母、父亲、母亲诸如做人“要心好”、“要正派”、“要好好读书”、“要成大器”的谆谆家教。1962年，我怀着在长江之滨的黄冈二中慢慢织就的斑斓而又模糊的理想，考上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开始涉猎了一些中国古文化与新文化的典籍，对中国古代的文学和历史融注了更多的热情。读书、散步和遐想，则成为我寄托情趣的主要方式。1964年以后，我萌发了读研究生、做真学问的愿望。然而，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打碎了我的梦想！难以忘记，1971年4月一天的傍晚，我在“黄冈地区五七干校”南湖田间栽秧，解秧伸腰之际，茫然四顾，前方黯淡，曾经有过的憧憬顿时涌上胸间，心头隐隐作痛，不由长长叹息了一声，悄然抒发了些许沉积下来的愤恨与不甘！

1978年春，中国开始在重重困境之中筹划改革开放，我们终于有了攻读研究生的初级“人权”。当时我虽然已是黄州中学有点受欢迎的老师，但是仍然怀着早已有过的憧憬，兴奋地报了名。填报专业时，我选定了汉语史。这却并非由于特别的兴趣与认识，而是认为，这个专业似乎离开政治较远，既可能多一分平安，又可能少一些沾染，还能够做几许真学问。在武汉大学典雅娟秀的珞珈山和黄耀先（焯）先生、周大璞先生等导师的熏陶之下，我们认真地读书，快乐地思考，兴奋地议论。春风三年，我成长为一名汉语史的研究者和教学者，在《中国语文通讯》上发表了平生第一篇学术论文《敦煌变文词语小札》，并且得到了前辈学者蒋礼鸿先生的肯定。这都促使我开始生发了在这个领域里安身立命的初步自觉。

可是，渐渐地，我感觉到要在这个领域里安身立命并不容易。汉语史的研究，历史悠久，领域广阔，材料无限，门类复杂；既有丰硕的成果，又有潜在的问题；材料的考据依然盛行，专书的研究方兴未艾，而探寻规律、开拓新径的尝试则明显不足。面对这样的局面，每一个认真地“为学术”的研究者，都应该立足当代，面向未来，更新观念，有所探寻，有所突破。为此，我曾经徘徊

通往中国语言哲学的小路

徊。然而，我不仅是书斋中的人，更是社会中的人。20世纪80年代，在神州大地上兴起了以探讨中华文化健康发展之路为主旨的“文化热潮”，它所释放的觉醒意识和人文关怀，深深地震撼了我。加之，我又深感从事“性之所近”的工作，能够增添无尽的快乐，能够激发出多一点的智慧。于是，我首先选择了词汇学和训诂学作为自己研究的方向，因为在汉语史领域内，它们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更为紧密、更为全面。

1985年，我带着一股心劲，认真阅读了胡适先生的《先秦名学史》和《新思潮的意义》。在前者的《导论》里，先生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给出了一个经典答案：“我们中国人如何能在这个骤看起来同我们的固有文化大不相同的新世界里感到泰然自若？”“我们应该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这个大问题的解决，唯有依靠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的远见和历史连续性的意识，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联结起来……因此，新中国的责任是借鉴和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这些久已被忽略了的本国的学派……这些就是我写中国先秦名学史的理由。”^[1]在后文里，先生向国人提出了创建新文化、推进新思潮的行动纲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引者按：标点符号为引者拟加）。这是学术的强音，有着爱国的热忱、世界的眼光，可贵的使命感！它使我想到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的学术道路、学术思想和丰硕成果。他们的声音很能启发中国学者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寻找到自己的正确方向，因而直到1985年仍然穿透了我的心扉！

获此启示，我在桂子山上潜心研究，先后撰写了两组学术论文和一本学术专著：一组论文是《段玉裁对古汉语词义特性的探讨》、《段玉裁对古汉语词义关系的研究》、《王念孙“因声求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一组论文是《古汉语词源结构中的文化心理》、《汉语词义结构的新思考》、《汉语词义引申中的文化心理》，一本专著是《古汉语词汇学简论》。这些粗浅的研究，都是尝试着“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文化的精华联结起来”而走向“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高远目标。同时，我也由此而逐步认识到：词汇与文化具有必然的互动关系；在汉语语词创造发展的特征与规律中，总能昭示出中华文化创造发展的特征与规律，并像化石一样可信可据。这样，我渐渐培养起一种追问自己撰写某种论著之“理由”的习惯。

由于“文化热潮”的激荡，由于初步尝试的领引，我对于研究汉语词汇与中华文化的互动关系有着越来越大的兴趣。于是邀集四五位有志于此的学友，请出我们的老师邢福义先生挂帅，主办了武汉地区的首次语言与文化研讨会，进而吸收更多的同仁，共同撰写了全国第二部《文化语言学》，并于十年后再版。1989年以后，中国的“文化热潮”带着无限的遗憾逐渐消退，而我对于汉

语词汇与中华文化互动关系的研究，却更加执著，也有所深入，跟妻子刘伟合著并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的《汉语与中国新文化启蒙》一书，以及个人先后在《语言文字应用》上发表的《成语中介符号论》、《汉语命名造词的哲学意蕴——兼论任意性与可论证性的争议》两文，可以算是标志。正是在此基础上，我构拟了“汉语词汇研究的文化学视角”的理念，并且进行了具体的论证和自觉的实践。

由于上述研究有所拓展，我又对中国的古典解释学（经典解释学）产生了新的兴趣。这一则因为解释原本就是典型的文化活动，二则因为训诂学原本就是典范的古典解释学，三则因为创造一个语词便是对于它所指称的事物作出解释，运用一个语词便是表达对于它所指称的事物所作出的解释，流传的语词能为后人解释所指事物提供思考模式，我们本来就应该从解释学的角度去研究语词，只是以前未能发现罢了。1993年，我在第2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上，同时发表了《中国经典解释学研究刍议》和《朱熹经典解释方法论初探》两篇论文，打破了同期学报只限刊登同一作者一篇论文的惯例，开始了对中国古典解释学的研究尝试。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我的《王弼〈老子〉解释方法论》一文，为我带来了若干现实的益处；其实我自己倒是觉得，随后在《孔子研究》上发表的《朱熹〈四书〉解释方法论》一文，相比较而言要更为成熟一点。

2002年，我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在其《绪论》中，我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现在，人类历史已经进入了21世纪，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社会文化，大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态势在转型、在发展；大都要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重新筹划着社会生活、建构着人类理想。那么，在现在，在将来，文化经典是否仍然还有其伟大的历史价值？文化经典的解释是否仍然还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对文化经典解释活动的研究是否仍然还有其重要的历史作用？我们认为，即使是在新的时代里，文化经典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经典型文化，也必将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构成人类生存结构的一部分或可供选择的生存方式，其“历史性”也由此而具有“现实性”的意义。而不断地立足现实以解释文化经典，在解释中对自身各种可能性进行自我筹划，获取关于新的历史进程的启示，同时也使文化经典在解释中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也就必将是各个民族以及全人类的永恒事业。因此，文化经典、文化经典的解释以及对文化经典解释的研究，在各个民族的文化历史进程里，都永远是富有魅力的重大课题；对于肩负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以开拓现代化艰难进程的中华民族，更是永远具有特别的意义。本着这样的认识，自1991年以来，我就一直从事着中华文化经典解释观念、解释

方法和解释历史的研究，一直呼唤着在已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中国自己的解释学。

这就是我从事中国古典解释学研究、撰写《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的基本“理由”！

随着词汇学、训诂学、文化语言学、古典解释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我逐渐有了一种执著地追根寻源的意向。而语言形成发展的总根源，就在于人在语言活动过程中认识和表达生存空间（世界）。于是，我感受到了认知语言学的力量，认识到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探究汉语词义词汇形成发展的内在根据、基本规律及其在民族人与生存空间互动中的作用，并且以此作为汉语词义词汇系统研究的新起点，是何等的必要与重要。这样，我就形成了“汉语词汇研究的认知学基础”的理念，特别重视研究：分类与语词所指事物的类型化，概括与语词所指事物的词义化，表征与语词所建词义的词符化。这样就进而发现，汉语同源词、复合词的词符化过程，对概念亦即词义的组织作用、呈现作用、储存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往往既是对人的相关认知成果的凝聚与提升，也是对人的相关文化活动、解释活动的启动与引导。为此，我撰写了《“名”族词考论》、《“易暘揚陽”词族考论》、《“屯春”词族考论》、《汉语词汇的生命与生命力》、《隐喻：汉语词汇形成发展的一种机制》、《推理：汉语词汇形成的一种机制》等一系列论文。

如果说，长途跋涉，需要在适当的时候重整行装；那么，长期研究，就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反顾与前瞻，尤其是研究成果有了一点影响之后。2005年，我在反顾自己的学术道路时，发现自己虽然敢于探寻新的途径，甘于处在“非主流”地位，但是所激发的学术兴趣却有些“杂”，所拓展的研究路数却有些“散”，现在必须紧扣一个合理的中心，确立一个最高的目标，实现有机的整合，使“杂”与“散”成为真正的“开阔”。为此，我作出了新的努力，并应全国“现代汉语词汇学丛书”主编张志毅先生的邀请，将其成果结集为《从认知到哲学：汉语词汇研究新思考》一书。在其序言《汉语词汇研究感言》中，我坦陈：

学术兴亡，学人有责。每位学人责任的大小，应该取决于他自己的志向、能力和条件。本人自知不能对汉语词汇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又多好奇之心和任率之性，于是就到当今汉语词汇学苑的边缘地带，作些垦荒式的尝试。这就使我逐步认识到：人是通过语言而与其生存空间开展互动的，而拥有生存空间并在其中创造文化的；生存空间是通过语言而向人敞开的，而变得可以理解并因此具有意义和价值的。人的语言能力既依附于人的一般认知能力，也推进了人的一般认知能力；人因为有理性而有语言，也因

为有语言而有理性，更因为有理性和语言而成其为创造文化的人。所以，就其最高境界而言，真正的词汇研究，最好同时也是人的心智结构的研究，也是人的存在方式的研究；真正的民族语言词汇史，最好同时也是民族文化史和民族思想史，是民族人的发展史。词汇研究者应该充满并且表现出深厚的人文关怀。

有鉴于此，我试图建构的研究理念，是观照人的生存，着眼于民族人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历程以考察作为中介符号的语词；我试图确立的研究目标，是以“人”为最高目标，逐步探究汉语词汇在民族人认识世界、创造文化、发展自己的活动中可能发挥的独特作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结构、意义、价值与规律，进而从人的活动揭示人的语言，以人的语言彰显语言的人；我试图设立的研究视角，却有认知学的、解释学的、文化学的和哲学的，并且力图以民族人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为中心，结合成“认知——解释——文化——哲学”的视角联域。

而这本书，大体就是这一整合性研究理念的实践产物。

行进在学术之途中，有时就像漫步在旅游之路上，峰回路转、豁然开朗、柳暗花明的情景总能使人兴奋，催人奋进，而无暇顾及前方是否有艰难险阻。我被语言哲学所吸引的情景就是如此！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哲学的主题就是致力于理解他人、理解自己、理解人与生存空间（世界）的关系；因而哲学的基本问题被认为是“人如何活”、“为什么活”、“活得怎样”。而我们已经论证，人既是通过语言而与他人开展互动的，也是通过语言而与其生存空间（世界）开展互动进而认识和拥有生存空间（世界）的，又是运用语言并通过语言而在其生存空间创造文化的；人类最能体现其本性和本质的行为，作为人的独特存在方式的行为，能够“规定和划定‘人性’的圆周”的行为，能够激发人的“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智慧的行为，都是符号化行为，主要都是语词符号化行为。这正如中国上古哲人创立的一系列命题所显示的，“以名举实”、“循名现实”、“名定而实辨”、“物谓之而然”、“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那么由此可以推知，语言哲学的主题应该就是致力于探究人又是如何通过语言而与他人开展互动的，而与其生存空间（世界）开展互动进而认识和拥有生存空间（世界）并在其中创造文化的，而塑造自己的“人性”并激发自己的“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智慧的。因此，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该归为“人如何通过语言而存在”、“人如何成为语言的动物”、“语言如何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这应该成为语言研究的最高目标！

这一认识使我豁然开朗：以往，我们观照人的生存，着眼于民族人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历程以研究词汇学和训诂学，研究文化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古

典解释学，不就是探讨人是如何通过语言而与他人开展互动的、而与其生存空间（世界）开展互动的吗？不就是探讨人是如何通过语言而认识和解释生存空间（世界）并在其中创造文化的吗？虽然理论的自觉还很不够，但在实际上，不是已经踏上了通往语言哲学的一条小路吗！我“整合”思路，不就是要“整合”到通往语言哲学的小路上吗！

我不由兴奋起来，似乎真的登上了语言哲学领域的一处小山，回望我所走过的崎岖道路，仿佛都有一种新的呈现！再往前方的高峰上看，又见到几位身影飘然的中国古代哲人在向我招手，好像是在告诫我：中国早已有了自己的语言哲学理论与实践，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焕发出了奇异的光芒，只是在千百年后又被专制社会的沙石所掩盖！而重新发掘和整理中国自己的语言哲学理论，正是你们这辈后学的责任！你们能有春秋战国时代哲人学者那样的人格风采，能为此而开展真正自主、自由的百家争鸣吗？

我从兴奋中冷静下来。我应该怎样诚挚地回应中华先哲呢？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被自己的思想境遇、为学经历所触发，被社会的信仰危机、改革期待所触发，被一位作家发出的“到将来文化崩溃的时候，今天的知识分子都将被追究罪责”的呼喊所触发^[2]，我就起而追随时贤探讨过“在目前的社会状态下，应该如何增强读书人的使命意识，应该怎样激励读书人的独立人格”等问题，出版了《中国读书人的理想人格》一书。我也曾提出：读书人亦即“知识分子”，在充满矛盾与疑虑的社会里，“应该以创造文化、阐释文化、传播文化、应用文化为职守，以追求真理、评判社会、校正现有价值观念、创建科学理论思想为己任，具有独立品格和原创能力，具有超越精神和人文关怀，能够为实现真正的自我、为推进人类的文明而不懈努力！”理想人格的探讨，确实激励了我，我也为此而一直在真诚地努力；只是能力小、成果少，未能达到一定的境界。但是，我现在虽然未满六十八岁，却已退休两年，还要继续努力吗？

当我从兴奋中冷静下来时，我想起了朱光潜先生的见解：人的生活应该“就是艺术作品”，最好具有两个“美点”：一是完整，“一字一句之中都可以见出全篇精神的贯注”；二是本色，“在什么地位，是怎样的人，感到怎样情趣，便现出怎样的言行风采”。当然，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艺术化的人生还应该具有创造性，“创造之中必寓有欣赏，生活也是如此”^[3]。还记得王船山在《七十自定稿》自序中说过：“秋未尽，蝉不得不鸣！”西方哲人伊壁鸠鲁也曾指出：追求审美人生的贤者，“享受时间也不是单单度量它是否长远，而是度量它是否最合意。”^[4]所有这些，都使我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与启发！现在，我衣食无忧，家庭和乐，子、媳自立，孙孙聪明可爱，我理所当然应该一如既往地追求一种完整的、本色的、创造的、合意的人生，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必须继续努力探索，直到不可预测的永远！或许，这样还能有益于身心的健康呢。

尽管通往中国语言哲学的小路尚未彰显，然而非常幸运的是，我并非孤独的寻路者。即使是在家庭里，也有妻子刘伟相伴随。我俩傍晚在校园漫步时曾经笑谈：在人生的长路上，过去已经是、将来也要是“并肩地行进着，行进中快乐着”！果然如此，我将来可能还有新的学术成果，回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推选我们编撰《自选集》、筹划“教授文库”的盛情雅意，回报所有的教我者、知我者、励我者，回报我们民族的光辉文化！

周光庆

2011年2月1日于桂子山

注释：

[1] 胡适：《先秦名学史》，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8、10页。

[2] 张承志：《中国知识分子的“参照系”》，《东方艺术》1996年第1期。

[3] 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533～535页。

[4]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3页。

目 录

自序——探寻通往中国语言哲学的小路	(1)
-------------------------	-----

汉语词汇研究的新思考

汉语词与词义研究的新思考	(3)
汉语词汇的生命与生命力	(16)
汉语同源词形成的认知·文化机制	(25)
汉语复合词形成的认知·文化机制	(37)
隐喻:汉语词汇形成发展的一种机制	(50)
“教”族词的形成发展及其文化意蕴	(59)
“名”族词考论	(68)
“易暘揚陽”词族考论	(74)
“屯春”词族考论	(79)
中华文化关键词“和·同”考论	(86)
“中”:从日常语词到哲学语词的发展理路	(95)
语词的“哲学义”何以可能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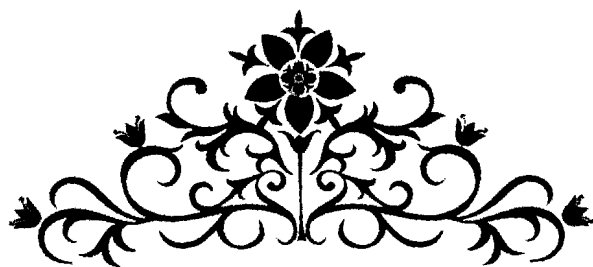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解释学初探

由中国训诂学走向中国解释学	(117)
中国古典解释学的初生	(127)
词义的召唤性、运用的主体性与解释的创造性	(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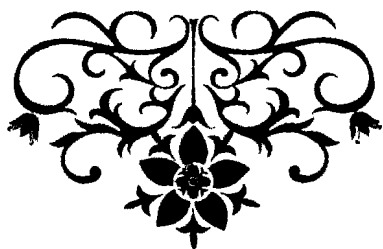
孟子“以意逆志”说考论	(152)
王弼《老子》解释方法论	(163)
朱熹《四书》解释方法论	(176)
戴震《孟子》解释方法论	(187)
汉宋明《诗经》解释的人文启示	(199)

中国读书人理想人格探讨

魏晋风度的人格内涵	(215)
新时期老一辈学人对理想人格的反思	(229)
新时期新一辈学人对理想人格的探讨	(240)
论读书人的自我实现与人文关怀	(251)
周光庆主要著作简目	(263)



汉语词汇研究的新思考



汉语词与词义研究的新思考

正如现代语言学创立人索绪尔指出的:词“是一个加于我们的心理的单位,是语言的机构中某种中心的东西”^[1]。而在我们看来,词义则是这种“中心的东西”的灵魂。所以,无论从哪一视角研究语言,首先都必须着力于词和词义,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词和词义的范畴,从而明确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事实上,人类对于语言的自觉研究都是从词和词义开始的,其历史之悠久,其成果之丰富,其人文关怀之深厚,自是人所共知的。特别是从西方哲学开始“语言转向”以后,词和词义的考察分析更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关注的焦点。

然而,非常奇怪因而也发人深省的是,尽管古今中外许多哲学家、语言学家根据各自的需要,遵循各自的视角,细致考察过词汇、深入分析过词义,对其作出过许许多多富有启示性的界说,却很难有一种界说能为多数学者所满意,因而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困惑,也使相关的研究异彩纷呈而无所主导。甚至有人认为,新的观点只能增加新的含糊与混乱,不如放弃这两个过于困难的范畴。

而在我们看来,建立词和词义范畴的问题之所以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纠结,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研究者过于熟悉某些尖新的问题,而忽视了一些最普通、最基本的问题。譬如,语词符号与其他各种信号和符号相比较有何特异之处?语词符号形成发展的基本动力何在、主要方式为何、多重效应如何观察?人为什么需要、为什么能够创造语词符号?人是在怎样的环境里、运用怎样的方式创造语词符号的?语词符号何以能够帮助人认识世界、建立社会、创造文化?如果别开生面,沿着这些最普通、最基本的问题所启示的方向探索下去,或许倒能找到建立词和词义范畴的切近视角,进而打开词和词义研究的新局面。

正是基于这样的反思和认识,我们才要在现有的基础上,为建立词和词义的范畴、为探寻研究词和词义的新视角、新目标、新思路而进行新的思考。

一、开启多维视角而突出主要视角

根据我们的思考,观察和研究汉语词与词义,首先必须感知到它们在汉语

通往中国语言哲学的小路

系统中的存在和在汉民族与其生存空间互动中的存在,必须感知到它们对主体人而言的存在和对指称物而言的存在,必须感知到它们的整体性、系统性存在和部分性、个体性存在,必须感知到它们在贮存状态中的存在和在创造、运用状态中的存在,从而开启多维的观察研究视角。每一种研究视角必有自己的彰显性和遮蔽性,必有相应的独特性与关联性,每一种研究视角都不能包打天下,也不能相互代替。但是应该强调,在这种多维视角中,有一种更为根本、更为主要、更为关键的视角,应该开拓出来并且加以突出,那就是立足汉民族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历程,关注民族人的造词、用词、释词活动,体察汉语词汇作为表征符号、中介符号形成发展的机制与规律。

众所周知,人类起源于动物,并且又和各种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都各有自己独特的生理机能、生存需要、生活方式和生活经验,相应地又都各有自己独特的生存空间。在各自的生存空间里,真正的现实就是由自己与其生存空间相互作用而构成的。然而,正如符号哲学大师卡西尔论证的:“在使自己适应于环境方面,人仿佛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除了在一切动物的种属中都可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以外,在人那里还可以发现可称之为符号系统的第三环节,它存在于这两个系统之间。这个新的获得物改变了整个的人类生活。与其他动物相比,人不仅生活在更为宽广的实在之中,而且可以说,他还生活在新实在之维中”以“应对”外界刺激。“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2]符号与动物也能掌握的信号根本不同,它具有由使用者共同约定的约定性、表现形式与所代事物无必然关联的任意性,具有在空间上与所指事物的分立性、在时间上超脱所指事物的永久性,因而能够超越此地此时的具体情境以指称任何“在场”或“不在场”的事物,能够表达特定对象的相关信息,能够帮助人综合经验、增生经验、使经验得以表达和传承,进而能够促使人类创造和运用一种与所有动物完全不同的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方式。

在人类所创造、运用的符号中,语词符号无疑是最重要、最灵便、最有普遍适用性的。这是因为:语词是一种听觉符号系统,它以语音为物质形式,以事物为指称对象,以意义为表达内容,具有层级性、系统性,可以灵活组合,无须依附它物;语词是一种表达符号系统,它划分事物使之从背景中突显出来而成为表达对象,它概括特征使之从事物中突显出来而转化为意义,它表达意义使之得到交流传播而不断增值。正是依靠语词,人类才能逐渐改造原有的交际方式,建立以语词符号为工具的语言级别的交际方式,组成以语词符号为纽带的人类级别的社会组织;正是依靠语词,人类才能逐渐改造原有的思维方式,培养起一种分离各种关系并在抽象意义上思考那些关系的能力,亦即具备关系思维;正是凭借语词,人类才能逐渐培养起一种从混沌茫茫的感性现象之流中别择出某些固定成分进行专门